

## 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困境与政府因应(1945—1947)

袁凯旋 王先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抗战胜利后,天津面临着战争导致的粮荒与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上涨困境,两者交织起伏,使供需矛盾突出。天津市政府通过向中央“求粮”获取敌伪存粮、开仓平糶,赴产区“购粮”增加储备、疏导粮源,同市场“争粮”促进流通、降低粮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给困境。然而,由于战后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粮源难以为继;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粮食首当其冲,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加之政策又违背经济规律,因而战后天津的粮食供给由最初的困境一步步走向“绝境”。

**【关键词】**战后天津;粮食问题;平糶;市场管制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2-0065-16

### A Study on Tianjin's Food Supply Predica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45—1947)

YUAN Kaixuan WANG Xianming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ianjin was faced with the predicament of food shortage caused by the war and food price rise caused by inflation. The two intertwined ups and downs made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prominently. The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had to seek the cons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grain in the warehouses in order to provide food for the people; to encourage merchants to go to the grain-producing areas to buy grain in order to increase warehousing; and to regulate the marke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pply and reduce the price of grain, which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d the predicament of food supply. However, as the market network centered on Tianjin was greatly shrunk after the war, so that the food supply was unsustainable; inflation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so that the grain market was difficult to operate normally; the market policy violated the economic law and wa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for a long time. As a result, the food supply predicament in Tianjin after the war couldn't be resolved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Tianjin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ood problem; Ping Tiao; market regulation

粮食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而粮食供给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

[收稿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

[作者简介] 袁凯旋(1996—),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王先明(1957—),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乡村史等。

展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聚集于城市,但战争、灾荒的频发亦使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面临很大挑战。如何解决这些人口的“吃饭问题”,体现着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治理能力。对于近代城市粮食的供给问题,前人已做过诸多有益探索。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在时间上多集中于抗战胜利前,尤以论述沦陷区城市的粮食统制与配给问题为重,对战后关注较少;在地域上则更多地关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少有文章述及天津,而天津在整个华北乃至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其粮食问题尤具独特性和典型性,值得深入探究<sup>①</sup>。

民国前期,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供给着市内市外之粮食。然而沦陷期间日伪在天津的粮食统制破坏了市场的供需平衡,使粮食供给成为一大问题。上引有关其他沦陷区的研究也表明,沦陷时期日伪在各大城市均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措施,穷尽民食,以为军用,以致粮食供不应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抢占了收复区的诸多大城市,但如何摆脱粮食供给困境,效果如何,目前较有代表性的仅有马军,以专著的形式对战后上海的粮食政策及其演变过程作了研究<sup>②</sup>。而在近代历史上,天津之于华北,犹如上海之于江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天津政权又将如何解决粮食供给问题,目前尚无研究论及。因此,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以及相关报刊资料论述战后天津面临的粮食供给困境与政府的应对措施,并探究该困境出现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将研究时间限定为1945年至1947年,是因为该阶段天津的民食治理主要由市政府主导。而1948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天津民食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五大都市”配售政策<sup>③</sup>,需另文撰述。

## 一、交织的困境:战后粮荒与粮价上涨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开埠后,天津一跃成为华北最大的贸易港,起着沟通国内外物资交流的重要作用。繁荣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天津粮食业的发展:“自东北迄至西北,南下华南以及美、澳、南洋等地,均向天津输入粮食,以致交易频繁,日臻兴盛。”<sup>④</sup>这一转变促使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国内外之粮食,皆以此为集散地;华北数省之丰歉盈绌,亦均赖此行运调剂”<sup>⑤</sup>。在此基础上,“京、津的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sup>⑥</sup>。对照以往,沦陷时期由于日伪在天津实行了全面的粮食统制,控制了粮食的产销渠道,破坏了粮食市场,使战后天津出现了粮荒困境。

### (一)日伪统制与民无余粮

“七七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我国华北广大地区。受战争影响,华北沦陷区内土地生产条件不断恶

① 关于抗战爆发前粮食供给的研究如樊如森:《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袁熹:《近代北京的粮食供应》,《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关于沦陷区的研究如齐春风:《沦陷时期南京的粮食供应》,《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丁志远:《“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粮食供应问题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秀孟:《匮乏的治理:太平洋战争期间上海的食物配给与日常生活》,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黄嘉良:《统制与诉求:沦陷时期日伪对广州民食问题之应对》,《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3期;张莉:《沦陷时期天津市粮食配给制度(1942—1945)》,《城市史研究》第4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1—47页;彭南生、马云飞:《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等。关于国统区的研究如陈默:《控制与失控:1940年四川省政府对川省米荒的因应》,《民国档案》2021年第3期。

② 马军:《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与美方签订“中美救济协定”。根据协定,美方将对中国实行粮食援助,并协助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五大都市试行全面配售制度。天津于1948年4月正式开始配售工作。

④ 《天津米面杂粮两市场之成立及其沿革》(1950年),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X0077-C-001626-004。

⑤ 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部编:《天津粮食业概况》,1937年,第4页。

⑥ 樊如森:《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化,农村粮食播种面积及单位产量迅速下降<sup>①</sup>。据统计,1938年华北地区小麦产量减产3成,面粉产量不及战前的一半。1939年,受旱灾及水灾影响,素来向天津输出粮食的华北4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之小麦普遍减产30%,杂粮减产约40%,稻米减产约80%<sup>②</sup>。

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尤其是对军队和日侨的供应,日方对天津的粮食供给实行了一系列的统制措施。1939年11月,日方成立了“华北日本人米谷统制委员会”,并在天津成立分会。该会对日本军民习惯食用的大米实行严密的统制(包括进口、运输、贮存、销售与配给等环节),“既严禁中外商人囤积和投机取利,又禁止一般中国百姓食用”<sup>③</sup>。1940年,为了筹措军粮,日本在天津筹建了“军粮城精谷株式会社”,建立了一个集开垦农场、种植水稻、收购、储运、加工为一体的农业掠夺垄断集团,以低价购入津郊稻农所生产的稻谷<sup>④</sup>。1941年7月,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英美等国家对日实行物资禁运,东南亚的粮食也不再运津,日军则完全禁止民间流通和食用米谷;9月15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公布了日伪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制定的该年度的米谷收买计划,指定日本三井、三菱商社和军粮城精谷株式会社收买芦台、军粮城、小站和天津近郊地区的稻谷,并规定“非当局指定之商号或个人不得收买”<sup>⑤</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甚至查封了太古、怡和、轮船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的仓库,强行“收买”粮商存放于其中的米面<sup>⑥</sup>。

1942年初,为了加强对粮食消费的控制,日伪天津市政府逐步建立起了“粮食配给”制度。所谓“配给”,即由日伪控制的“华北食粮平衡仓库天津支部”提供食粮,通过配给机构定期、定量地售卖给持有购买证明的市民。但实际上“配给粮”不仅杯水车薪,而且质量难以保证。该制度实质上体现了日方挤压民食满足军粮的需求<sup>⑦</sup>,致使“中等以下之人民大部分不能维持生活”,乞丐与无业游民数量增多,甚至有饿昏街头者<sup>⑧</sup>。

抗战胜利后,相关粮食清册显示,天津接收各公私仓库之日伪杂粮仅3.6万余吨<sup>⑨</sup>。又据1946年1月的积谷情况调查,天津、静海、宁河、武清4县中,仅武清县尚有积谷2526石5斗4升9合<sup>⑩</sup>,约合224余吨。1946年7月,张廷铎称天津粮食消耗量“月需三万吨左右”<sup>⑪</sup>。而依李洛之等人的估算,战后天津各类粮食的年需要量为576356吨,合每月4.8万余吨<sup>⑫</sup>。依此,府库存粮实难足全市月余之用。

总之,日伪通过粮食统制挤压民食以供应军队,造成人为粮荒,这严重剥夺了天津市民的“吃饭权利”。而战时统制造成的巨大粮食缺口,则成为战后天津市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二)接收不当与粮价上涨

与粮荒交织在一起的,则是由国民政府不当的货币接收政策引起的粮价阶梯式上涨的困境。1945

① 参见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②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228页。

③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第138—139页。

④ 李默生:《从军谷公司到米谷统制会》,政协天津市东郊区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天津东郊文史》第1辑,1988年,第87—88页。

⑤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⑥ 朱仙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98页。

⑦ 参见张莉:《沦陷时期天津市粮食配给制度(1942—1945)》,《城市史研究》第42辑,第34—35、39—47页。

⑧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00—701页。

⑨ 《接收各敌伪粮食机关册存杂粮数量表》(1945年12月3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

⑩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第21页。

⑪ 《购存食粮临时会议纪录》(1946年7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14。

⑫ 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处印行,1948年,第146—147页。



年8月,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原本受到物资管制的商品大量半价抛售,全国物价突然下跌。”<sup>①</sup>天津市面亦是如此。据《益世报》的记载,抗战胜利后,津市物价一泻千里:8月25日的行情较沦陷时期之最高峰下降90%~95%<sup>②</sup>。《大公报》对此也有报道:八九月间的天津市面“物资充足,物价一月以来起伏不定,然较两三个月前跌落至多。人民前于夜间即排立店前待购杂合面之现象已不复见”。<sup>③</sup>

可惜好景不长,自9月下旬开始,物价又复猛涨,至12月份,各种物价反比沦陷时期峰值还高<sup>④</sup>。尤其是日用必需品的零售价格居高不下,并以食盐、烟煤、火柴、报纸4种物资涨价最烈,其中烟煤价格较11月中旬上涨136%,食盐价格增长了1倍,火柴与报纸价格也分别增长了94%与65%。自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伪联币的比率为1:5后,“各商竟有藉此机会将原订伪币之价改售法币,无形中增加五倍以上”<sup>⑤</sup>。

将伪币清理出流通领域,体现了国民政府重新控制收复区金融市场的意图。只是在决定兑换比率时,其并未遵循价值规律,反而人为地拉大了两种货币之间的价值“剪刀差”。因为若将当时华北的批发物价指数(104868)与整个后方地区的指数(245503)进行比较,法币与伪联币的兑换比率应是2:1。而现行比率导致了伪联币的大幅贬值,从而加剧了包括天津在内的收复区的通货膨胀<sup>⑥</sup>。通货膨胀的不良影响,最先体现在黄金买卖上,进而影响到粮价。1946年1月7日,“四行二局”<sup>⑦</sup>正式开始收兑天津的伪联币。受之影响,市面上倒卖黄金的风气日盛,金价扶摇直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硬通货”的粮食价格亦随之上升。据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的统计,1946年2月下旬,天津市的粮食价格指数为469.93,较1945年11月上漲了4倍多<sup>⑧</sup>。

观之天津市1946年1、2月份的粮价与金价走势图(见图1)可以发现,1946年1月7日之前,粮价与金价走势尚且平稳,波动较小;而1月7日后,两者价格日趋上涨,如影随形,并于2月下旬到达顶峰。对于1946年黄金与物价的关系,时任天津某报社编辑的周启纶在日记中记道:“物价有时亦见稍落,但一落三涨,来势更猛。其规律总是黄金领先,粮油紧随其后。”<sup>⑨</sup>

市面物价如此高涨,甚至较日伪时期仍高,使市民生活压力巨大。有市民将物价上涨之原因归结为“商人操纵”,并上书天津市政府冀求其“平抑物价,力压奸商操纵”<sup>⑩</sup>。对此观点,天津市政府并不认同,而是认为“战后物价高涨,经济恐慌,乃为东西各国必有现象,非独本国为然,亦非独华北为然”。同时,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总结了天津物价波动的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交通被破坏,海运未恢复,以致物资流通不畅,只见消耗而来源枯竭;第二,接收敌伪之工厂、物资等不归市政府管辖,而中央派下的主管部门工作效率低下,以致工厂不能复工生产、物资不能得到释放,几成冻结状态;第三,

① 魏文享:《“讨价还价”: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1946—1949)》,《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 《平抑本市物价,社会局拟订办法》,《益世报》1945年12月14日,第2版。

③ 《天津情况安谧,市面物资充足,物价跌落》,《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30日,第2版。

④ 《平抑本市物价,社会局拟订办法》,《益世报》1945年12月14日,第2版。

⑤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物价暴涨事给天津市政府的签呈》(1945年12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753-001。

⑥ 张嘉璈著:《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79页。

⑦ 所谓“四行二局”,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之合称。

⑧ 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编:《天津每日足金、美钞价比及股票、粮食市价指数》(1946年3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889-004。

⑨ 周启纶:《解放前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纪实》,1946年12月27日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7页。

⑩ 《王育裁为商人操纵物价事致天津市政府的函》(1945年12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1158-001。

战后大量地方游资进入市内,影响物价<sup>①</sup>。而在这些原因中,交通一时难以恢复,游资亦难管理,能迅速缓解物资缺乏问题的做法就是接手敌伪物资,并将其分配给市民。因此,为了保证粮食供给,使粮荒不至演变为饥荒,天津市政府开始向中央争取敌伪在津存粮的处置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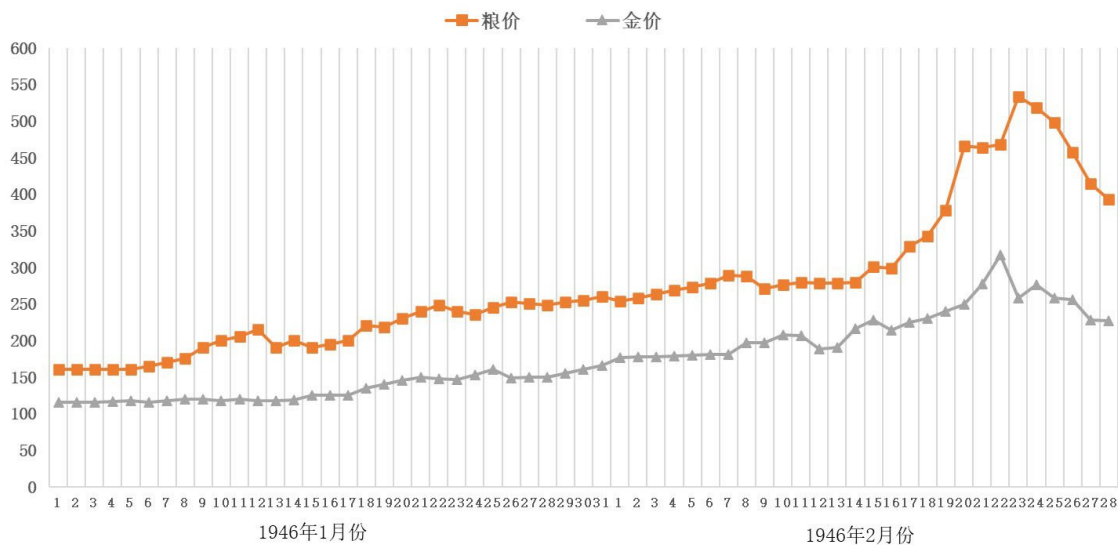


图1 1946年1—2月天津粮价及金价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天津市政府统计室编《天津每日足金、美钞价比及股票、粮食市价指数》(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889-004)绘制。

## 二、向中央“求粮”与平糶的开展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委派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到津,组建了新的市政府,并召集中央各部在津机构开会议事,其中粮食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sup>②</sup>。与此同时,天津市民对于政府解决食粮问题也有殷切期望:“外界法团及民众代表为生计所迫,纷请救济,莫不急谋解救。”<sup>③</sup>10月16日,即有市民鲁琴宣上书天津市政府,请求以敌伪仓库存粮举办平糶或施以赈济:

窃缘津市民食,自经中日开战以来,而日人每岁大数吸收民食,尽归伊之仓库所有。该民食每岁吸收后,伊之统制民食之令早经颁布,不准人民自由贩卖。因此民食恐慌即在斯乎,然死于民食恐慌者亦复不少。今日人既经无条件之降服,完我国土,而我市长二次奉命莅任,津市所有全市父老兄弟,无不若赤子之望父母,逝而复来也。我长者接篆视事后,闻先以民生为主。今故微进一言,念倭人仓库既归我国没收,应吁恳转详,或平糶,或赈济,早为实现,俾纾民困<sup>④</sup>。

然而鲁琴宣不了解的是,敌伪仓库存粮的处置权并不在天津市政府,而是归粮食部所有。抗战胜利

①《天津市政府为解答目前物价高涨民生不安原因事给王育裁的批文》(1946年1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1158-002。

②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③《天津市政府为已责成社会警察两局会商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办理平糶事致行政院电》(1945年11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2。

④《鲁琴宣为请将没收日伪仓库食粮举办平糶或赈济事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5年10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055。

后,国民政府公布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行政院下属的各部、会、署、局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及接收委员,处理沦陷区的敌产接收问题<sup>①</sup>。依此办法,粮食部长徐堪即组织人事,向各地派出粮政接收员组办特派员办事处。只是粮食部虽在天津设有“特派员办公处”,但未及办公即被撤销<sup>②</sup>。之后,天津粮政被划归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以下简称“河北田粮处”)管辖<sup>③</sup>,但市内粮商及粮食市场仍归社会局管理<sup>④</sup>。11月14日,河北田粮处副处长霍卜臣奉命来津主持接收敌伪粮食,计接收华北粮食公社天津办事处、米谷统制会、华北平衡仓库天津支部、军粮城及军谷公司粉谷部天津支部、寿丰一二三厂、福星公司、元昌祥、益顺行等机构<sup>⑤</sup>。12月初,接收工作基本完成<sup>⑥</sup>。

面对市民对于粮食的急切需求,张廷铎为争取敌伪存粮的处置权开始了与粮食部的交涉过程。1945年11月,张氏致电行政院长宋子文、粮食部长徐堪,表示:其一,天津四周粮源运入市内甚少,粮食不能内运,导致粮价上涨,从而使市民及公务员购粮成本过高,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其二,天津市接收的敌伪存粮,除米面必须留归军队使用外,其他各种杂粮囤存日久,多有损坏。因此,张氏希望能将该项杂粮“拨归本市应用”,以解燃眉之急。换言之,他希望行政院与粮食部能够许可天津市政府越过河北田粮处的辖制,自由处理敌伪存津各项杂粮<sup>⑦</sup>。

在还未得到上级部门的确定答复前,张廷铎似乎有意“将生米煮成熟饭”,试图通过实际行动迫使其同意该申请。11月中旬,市政府着手制定了详细的平糶计划并将之发诸报端。16日,《立报》即刊载了天津拟用敌伪存粮平价供应市民之消息<sup>⑧</sup>。20日,市政府召集全市党政机关以及粮商代表召开平糶会议<sup>⑨</sup>。24日,批发粮业同业公会开会传达了相关命令,并要求凡“会员中前任配卖店者,仍充此项粮店,务须仰体当局苦旨,勉力报效”<sup>⑩</sup>。所谓“前任配卖店”,即日伪时期担任过“粮食配给”工作的粮食零售店,也就是说,天津市政府准备按照日伪时期“粮食配给”的模式开仓售粮。26日,张氏又向行政院去电一封,表示市政府已责令社会局、警察局与河北田粮处会商配拨粮食问题,并议定“先由接收天津地区敌伪粮食内提拨杂粮2万吨”。随后电请该处处长克日开仓,如数拨付<sup>⑪</sup>。天津市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显现出其对粮食处置权的志在必得,可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

12月2日,粮食部发来的电令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徐堪表示天津接收的敌伪杂粮,不能拨发天津

①《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1945年8月),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等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00页。

②孔令朋:《今生今世》,第155页。

③1945年11月,河北省田粮处成立,主要办理河北、天津等地的田赋征收、余粮征借及军粮筹购等事物,并负责接收日伪粮食管理机构移交的粮食仓库、面粉加工厂(参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47卷《粮食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④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商业志·粮食卷》,第13页。

⑤《津粮政机构已开始接收》,《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18日,第2版。

⑥《天津市政府为请赐饬粮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以济民食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1945年12月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8。

⑦《张廷铎为津市所有敌伪存粮除留归军用外拟请规划本市应用事致行政院、粮食部电》(1945年11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1。

⑧《要闻简报》,《立报》1945年11月18日,第2版。

⑨《天津市平糶会议纪录》(1945年11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37-1-000567-001。

⑩《益泰精米制粉厂滕沛林为请早予复业藉营平糶粮店业务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5年11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303。

⑪《天津市政府为已责成社会警察两局会商办理平糶事致行政院电》(1945年11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2。



市政府处理,而应由河北田粮处“尽先搭配军粮,其余照市价陆续在津出售”<sup>①</sup>。粮食部做出这样的决策也并非别无征兆,徐堪曾明确表示过战后粮政的基本原则:“今后粮政重心,首在筹拨军粮,次在供应民食。”<sup>②</sup>

在此逻辑下,12月8日,粮食部又来电一封,略带有抚慰与解释的意味。在电文中,徐堪首先表明了粮食部对平津地区的粮食问题已有既定的解决办法,即以善后救济署的救济粮为主。其次,在“先军粮,次民食”的原则与“军粮有着,地方自安”的思想下,徐氏仍未许可市政府自由处置日伪存粮,只同意先拨出混合粉50吨,在市场上按九五折出售,这无异于隔靴搔痒。最后,徐氏授之以“治本方法”,即让天津市政府商请军事机关“疏通运道,保护粮运”,活跃粮食市场<sup>③</sup>。总之一句话,日伪在津存粮,没必要也不可能划归市政府举办平糶。

粮食部的决策,无疑让张廷铎进退两难。举行平糶之事早已发诸报端,且由于进展缓慢,社会舆论对此已有批评。市民王怀珍就曾揶揄此事:“本市两月前即盛倡开仓库济贫民,可是直到现在市民快要饿死,并未开仓平糶,此种政治真堪痛叹。”<sup>④</sup>《大公报》亦以《快办平糶》为题撰写短评作为催促<sup>⑤</sup>。因此,如市政府不能接手日伪存津杂粮,平糶计划将会落空,进而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与社会稳定。

无奈之下,张氏只好越过粮食部,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先后发出两封等级为“万急”的电报——其中第一封长达六百余字,以述说境遇之窘迫。这两封急电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其一,说明天津民食现状:日伪“统制”后,“市民食粮久告缺乏”;其二,表示当下困境:市政府本已拟好平糶办法以解决民食问题,不料受到粮食部阻力,未能实行;其三,警示可能的后果:敌伪存粮本取之于民,若不将其平糶于民,必会寒民心、扰治安。总之,张氏希望蒋、宋能够理解天津之艰难,“赐飭粮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sup>⑥</sup>。

1940年蒋介石在大后方亲身经历过接踵而至的米荒与米潮,自然知道粮食问题的重要性<sup>⑦</sup>,因此乃批示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sup>⑧</sup>将平津两市接收之敌伪杂粮交由“河北、平津两市平均分配,以维各地平糶救济之用”<sup>⑨</sup>。至此,天津市政府终于解决了平糶粮源问题,获允杂粮2万吨,实拨1.8万余吨(见表1)。

1946年1月14日,天津市政府正式发出布告,宣告平糶开始<sup>⑩</sup>。按照计划,此次平糶按“分次、分区、分期”之原则在1月和3月分两次六期举行,市民可凭证购领,第一次10斤,第二次9斤,共计19斤杂粮。据后续统计,此次平糶粮内因拨去粥厂赈济粮、囚粮及学粮,实际用于平糶的粮食数量为1.5万余吨,最终结余4百余吨<sup>⑪</sup>。平糶价款内,除去开支,共计结存一亿五千四十万余元。按照设想,结存款项将用以办理“长期平糶”,此事留待下文。

①《粮食部为接收杂粮一事致天津市政府的电》(1945年12月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5。

②《军粮民食供应,本年无问题》,《民国日报》1945年11月25日,第1版。

③《粮食部为复收日伪存粮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代电》(1945年1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9。

④《王怀珍为吁请停止取缔沿街摊贩给市政府的呈》(1945年12月2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177-070。

⑤《快办平糶》,《大公报》(天津)1945年12月26日,第3版。

⑥《天津市政府为请赐飭粮食部即将津市杂粮拨归市用以济民食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电》(1945年12月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8;《天津市政府为再请准将接收津市杂粮拨归本市办理平糶给重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的代电》(1945年12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13。

⑦参见陈默:《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⑧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1945年12月1日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主要负责河北平津地区敌伪物资、房地产的调查、拍卖、发还等事宜。

⑨《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为准十一战区及田粮处暨军粮筹购委员会电嘱拨救济及平糶用杂粮业经提会议决办法事的代电》(1945年12月2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21。

⑩《天津市政府关于平价售粮事的布告》(1946年1月1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27。

⑪《天津市平糶杂粮各种杂粮支配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9-2-008328-183。

表 1 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实拨天津市平糶粮明细表			
粮食品种	数量(公斤)	粮食品种	数量(公斤)
小米	82515	大豆	392325.5
玉米	781597	合豆	89100
高粱	1675582	吉豆*	163980
高粱米	285498	谷子	15290302.5
合计	18760900 公斤, 合 18760.9 吨		

资料来源:《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天津区储运处拨天津市平糶粮明细表》,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9-2-008328-159。\*吉豆即绿豆。

虽然在蒋介石的干涉下,天津市政府获得了部分仓库存粮办理平糶,但最终华北乃至全国的粮政,仍须由粮食部办理。天津市政府与粮食部的争论则体现了地方执政者与中央决策者对华北粮政的不同体会与分歧。徐堪在此事件中的态度表明,粮食部固然认为华北的民食问题需要解决,但在国共争端的背景下,华北军粮显得更为重要。而“军粮有着,地方自安”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政府高层对华北“先军事,后民生”的治理逻辑。

三、赴产区“购粮”与粮源的疏导

开仓放粮虽能迅速解决民食需求,但有限的仓储亦预示其难以持续的命运。因此上引电文中粮食部才会提醒“治本方法,重在粮能入市”。事实上,天津市政府此后的粮政重心确实放在了粮食市场方面。1946年1月,针对京津的粮食问题,河北田粮处制定了九项平抑粮价办法令天津市参考执行,主要措施包括:一、举办粮商贷款,扶助粮商在外购运,以疏导民食来源;二、实施粮食议价,以稳定粮价;三、管制粮商,举办粮食登记与粮食调查,查禁囤积居奇<sup>①</sup>。2月22日,因金价狂涨引起粮价过度上升,张廷铎主持制定了《平抑物价紧急措施办法》,规定:一、取缔黄金市场,禁止黄金买卖及出境,防止其影响粮价;二、禁止食粮囤积,令粮商恪遵议定价格出售粮食;三、在市区存粮尚丰,来源渐畅的情况下,将粮食交易归入斗店,严厉取缔黑市,以免操纵;并以低利贷款协助粮商出境采购,在运输车辆上尽量予以便利<sup>②</sup>。依此,天津市政府展开对粮食市场的治理工作,这是本节与下节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长期平糶”增加仓储

所谓“长期平糶”,是指天津市政府欲以“敌产平糶”所得之价款为底款购回粮食继续举办平糶,循环购销,以此来增加市内粮食储备量。早在上文所引的两封“急电”中,张廷铎就有意请求将此次“敌产平糶”之价款“除必要开支外,余仍作继续办理平糶之用”。只不过蒋介石在回电中对此未置一词。后经多次提请,才于1946年4月获得允准<sup>③</sup>。随后,平价售粮办公处即拟定了《天津市政府平价售粮办公处办理长期平糶办法》二十七条。该办法的核心内容是市政府将以“官督商办”方式,委托粮商向各产粮区域采购平民日常食用之杂粮,购回储存或办理平糶<sup>④</sup>。接着,社会局拟具了《利用平糶售粮价款一亿五千

① 《河北田粮处为调剂民食已商定办法事给天津市政府的快邮代电》(1946年1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78-001。

② 《天津市政府为发平抑物价紧急措施办法四项等事给社会局的训令》(1946年3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32-003。

③ 《天津市政府为社会局签以拟用平糶价款续办平糶等情核属需要给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的函》(1946年4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38;《行政院准许津市续办平糶》,《益世报》1946年4月24日,第4版。

④ 《天津市政府平价售粮办公处办理长期平糶办法》,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2。



万元抢购粮食续办平糶意见》，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承购商号、粮款分配、领款手续、督导人员等事项<sup>①</sup>。

1946年7月12日，市政府召集社会局、市党部、市议会及斗店业、批发粮业同业公会代表等召开“平糶购粮会议”，商量购粮计划<sup>②</sup>。最终，批发粮业与斗店业公会分别派出张广树、艾福宸、郑润三与马义斋作为采购人员，沿着平汉、北宁线分往昌黎与秦皇岛采购粮食。市党部之郭华栋、王贤方，市议会之苑宝璜、李洪岳、赵季扬等作为督察人员随行<sup>③</sup>。

虽然事先有所计划，但受市场状况影响，他们仍须根据现实情况调整采购路线。北宁线组采购人员因秦皇岛“行市与津市相等，再加入运杂费，(成本)自较津市为高”，转赴山海关外锦州、开原一带采购；平汉路组采购人员也因购粮成本过高而终止收购，转而前往东北购粮<sup>④</sup>。

据督导员郭华栋的购粮日记，自1946年7月23日出发购粮，至1947年4月22日购粮终止，采购人员先后辗转东北之锦县、新立屯、石山站、义县、兴城、彰武等地，花费法币约两亿元，购回元豆414748斤，小米486054.5斤，高粱580132斤，玉米592302.5斤，共合计1036余吨<sup>⑤</sup>。然此数量与“敌产平糶”之2万吨比起来，只当其二十分之一，难以面向全市发售。社会局乃决定将该项粮食用于拨借冬赈、配售贫苦学生或在春荒之时办理贫民平糶<sup>⑥</sup>。

为了增加粮食存量，1946年5月，市政府还开会商讨了《天津市平糶粮购储办法》，意图向各工厂、同业公会、银行、士绅等方面集资121亿元用于购粮，但最终仅从“四行二局”贷出十亿元<sup>⑦</sup>。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国民政府北平行轅<sup>⑧</sup>为缓解平津民食压力，亦曾向“四行二局”协商贷款，组建“平津两市购运粮食平糶委员会”并成立“天津办事处”负责办理购粮事宜<sup>⑨</sup>。这两次购粮活动之形式与“续办平糶”大致相同，但由于资金受限、办理缓慢等原因，均收效甚微，实难收“长期”之效。

## (二) 扶导贷款疏导粮源

除了“官督商办”购粮储存外，天津市政府亦向粮商发放了一定的低息贷款来激发其购粮的自主性。关于如何解粮源问题，早在战后天津市政府刚组建之时就有讨论。杜建时认为可在北宁路沿站设点派员收购，集中运津；孔令鹏则建议“鼓励粮商自购自运，而由政府负责铁路水陆交通的畅通，不限制粮商的合理利润”，因为这样既可以解决粮源问题，又可以防止派员收购容易引起的弊端<sup>⑩</sup>。1946年初，河北田粮处天津区储运处(以下简称“天津区储运处”)成立后，孔令鹏任主任秘书，即在粮食部的指导下，按照该思路举办粮贷，开拓粮源。

① 《天津市社会局为利用平糶价款抢购粮食续办平糶电请指派督导人员给天津市议会的代电》(1946年7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03。

② 《平糶购粮会议纪录》(1946年7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1。

③ 《社会局为采购粮食续办平糶采买人员一览表等事给天津市市党部、议会的公函》(1946年7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08。

④ 《社会局为分路购粮工作进行概况给市政府的签呈》(1946年8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23；《天津市平价售粮办公处为杜聿明电复协助保护东北平糶购粮事给郭华栋等的函》(1946年8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3-1-000033-019。

⑤ 《郭华栋为呈报东北购粮结束回津附缴工作日记等事给平价售粮办公处的呈》(1947年4月23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638。

⑥ 《天津市社会局关于东北购粮用途的签呈》(1946年11月3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76。

⑦ 《商讨平糶粮食购储办法会议纪录》(1946年5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669-006；《天津市平糶购粮办法》(1946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5辑(1945-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1页；《四银行拟办粮贷》，《益世报》1946年6月13日，第4版。

⑧ “北平行轅”全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的兼管平津、河北、山东等地区军事、政治事务的高级军政机构。

⑨ 《北平天津两市购运粮食平糶办法》，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129-2-003872-011。

⑩ 孔令朋：《今生今世》，第165页。

在胜利之初,天津市面上的粮食主要依靠小贩从四乡零星运来,远难以敷用。据河北田粮处统计,天津民食日需玉米面 100 万斤,面粉 5000 袋,稻米 500 包。战前,这些粮食完全依靠商人沿着津浦路沿线各县与东北的产粮区购买而来<sup>①</sup>。然而,天津沦陷期间粮业不振,粮商濒临破产,购买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政府若想盘活粮食市场,就不得不予以其经济支持。1946 年 1 月,粮食部与中国农民银行商定贷款 4 亿元,平均核发给北平、天津两市,用以辅导粮商购运粮食<sup>②</sup>。2 月 1 日,此项贷款 2 亿元即拨到天津市政府。接款后,其立即着手部署购粮事宜。

据《大公报》记载,2 月 15 日,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从此 2 亿元内先拨出 1 亿元托由红万字会向锦州购粮<sup>③</sup>。而据《天津经济新闻》报道,这 1 亿元实际由平津办事处副总理崔竹亭领去,于敌伪产业处理局购买东北急需之棉布、茶叶,前往锦州以物易粮<sup>④</sup>。3 月 9 日,天津区储运处会同社会局举行“辅导粮商贷款座谈会”,商议另外 1 亿元款项的运用事宜。会上孔令鹏表示:此次 1 亿元贷款为试办性质,目的在于畅旺粮源、调剂民食,进而希望各粮商能“藉政府之许可及协助,得到购运之便利”,努力竞购粮食运津销售。最终,按照各业粮商申请贷款之多寡,会议决定将此项贷款分配与零售粮业 2000 万元,批发粮业 4000 万元,斗店业 4000 万元(表 2)<sup>⑤</sup>。

表 2 天津市一亿元粮商贷款分配情况

粮业公会	具体商号申请数额	总计款额
零售粮业	计益顺行 1 家,贷款 2000 万元	2000 万元
批发粮业	计同和兴、同和成、永增厚、兴隆棧、仁记振泰棧 5 家,各贷款 660 万元;泰丰粮棧贷款 700 万元。	4000 万元
斗店业	计同孚新、怡和、华丰裕、万春 5 家斗店,各贷款 800 万元。	4000 万元

资料来源:《辅导津市粮商贷款(附座谈会纪录)》,《天津区粮食储运旬刊》1946 年第 1、2、3 合期(创刊号),第 16 页。

3 月 15 日,各粮商支款后即外出购运。购回之粮食将由政府召集各方议定价格后在市场出售<sup>⑥</sup>。据报道,三业粮商分赴河北沧县、石门及津郊产粮地区采买粮食。其中斗店业为了增强采买力量,加快采买频率,还“决定尽量收买各地运来之食粮,俾便各采买商每月可往返三、四次,利用资金循环不息”。天津市政府的辅导粮商贷款购粮,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对此,该刊评论道:“当局此项措施,实合乎津市需要,民食绝对无虞,粮价因之逐步下游矣!”<sup>⑦</sup>

#### 四、同市场“争粮”<sup>⑧</sup>与管制的进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物价政策愈来愈严格,经历了从“评议物价、平抑物价到限制物价的演

①《续办粮商贷款,疏广粮食来源》,《益世报》1946 年 5 月 19 日,第 4 版。

②《调剂平津民食:粮食部派员赴东北采购,并对粮商贷款四万万》,《益世报》1946 年 1 月 28 日,第 2 版。

③《粮贷款及粮议价会议决定:议价六日改定一次,贷款拨一亿元向锦州购粮》,《大公报》(天津)1946 年 2 月 16 日,第 3 版。

④《两亿元粮商贷款,购粮陆续运津接济民食,粮商按四四二办法分配》,《天津经济通讯》1946 年 4 月 1 日,载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 5 辑(1945—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80 页。

⑤《辅导津市粮商贷款(附座谈会纪录)》,《天津区粮食储运旬刊》1946 年第 1、2、3 合期(创刊号),第 14—16 页。

⑥《粮商贷款昨日拨付》,《益世报》1946 年 3 月 16 日,第 4 版。

⑦《两亿元粮商贷款,购粮陆续运津接济民食,粮商按四四二办法分配》,《天津经济通讯》1946 年 4 月 1 日,载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 5 辑(1945—1950),第 780 页。

⑧ 本节所谓的“同市场‘争粮’”,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管制措施,约束粮商将存粮更多地投入市场,进入流通环节,并尽力使市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粮食。

变”<sup>①</sup>。抗战胜利后,严格的“限价”政策已不适用。因此,行政院于1945年10月底通知各地政府,认为“抗战胜利粮价趋跌,各地实施粮食限价办法多已不能适合当前情事……各地粮食限价应即终止实施,改采议价办法”<sup>②</sup>。只不过当时天津市各机关正忙于敌伪物资的接收工作,尚无暇顾及此政策的实施。

### (一)实行议价

1945年底,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民怨渐起。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将“议价”提上日程,并训令社会局依据市场调查拟具抑制物价办法<sup>③</sup>。1946年1月4日,社会局召集各党政机关、银行部门、粮业公会代表等举行物价座谈会,主要议题聚焦于粮价方面。会上零售粮业与批发粮业公会指出,市外粮食产地价格上升与商人资本不足导致粮食不能大量运津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局则认为粮价上涨与“一般商人希图暴利、高抬物价”有关,应当对粮食实行议价措施<sup>④</sup>。因为根据调查,“各业货物库存数量甚巨,供应市民需要不虞缺乏,而一般物价反逐日上腾,继涨增高,殊非应有之现象”。所以“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计”,社会局决定从是年1月7日起实行同业议价。具体做法是由粮业公会“召集本业商号代表就现有市价公开评议,核拟合理价格”后报社会局核定,全市粮商一体遵照实行<sup>⑤</sup>。1月31日,批发粮业同业公会召集杂粮、斗店、米业三部分会员召开联席会议,议定粮食价格<sup>⑥</sup>。1946年2月上中旬,社会局分别核定了首次议定的粮食批发与零售价格(表3),除令四粮业公会下属各粮店执行外,并公告南门外、西马路旧义奥交界、小王庄、席厂、白庙等处的自由粮贩切实执行公议价格,不得自行开价成交<sup>⑦</sup>。

表3 天津市社会局核定批发食业与零售粮业公议价格表(1946年2月)

粮食种类	批发价格(每市斤/法币元)	粮食种类	零售价格(每市斤/法币元)	备注
高稻米	180	高稻米	192	
次稻米	172	次稻米	184	
白麦子	172	高小麦粉	220	白小麦制造
花麦子	168	次小麦粉	200	花小麦或红小麦制造
红麦子	164			
高玉米	72	高玉米面	80	
次玉米	68	次玉米面	76	
白玉米	68	白玉米面	76	
高小米	90	高小米	96	
次小米	82	次小米	91	

① 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

② 《粮食部为终止粮食限价办法给各省市府及田粮处的代电》(1945年10月2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1469-038。

③ 《天津市政府为依调查拟具制止物价办法给社会局的函》(1945年12月1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2-000753-002。

④ 《天津市物价问题座谈会纪录》(1946年1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27-007。

⑤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实行议价事给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的训令》(1946年1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27-008。

⑥ 《天津市批发粮业同业公会为拟定食粮公议价格事给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呈》(1946年2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1。

⑦ 《天津市社会局为核定批发食粮公议价格布告周知由》(1946年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3。



续表3

吉豆	88	吉豆	100
高粮	50	高粮	56
元豆	70	元豆	76

资料来源:《天津市社会局为核定批发食粮公议价格布告周知由》(1946年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3;《零售粮业公议价格》(2月14日核定布告施行),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6。

每次议价的间隔时间本为6天<sup>①</sup>。但2月中下旬,由于粮价暴涨3倍之多,市政府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自2月25日起成立“牌价小组”,由批发粮业、斗店业、零售粮业各推一人,按日公议。每日牌价由牌价小组于前日晚间议定,翌晨挂牌公告实行<sup>②</sup>。

然而,天津市政府虽能以行政手段统一粮价,但遵守与否则全靠商人自觉。社会局的调查显示:“各正式粮商尚能认真遵守,但零星粮贩对于议价多有希图规避,暗中操纵,将运津之食粮散匿各处,垄断居奇,囤积拒售等情事。”<sup>③</sup>1946年2月18日,社会局会同警察局在南门外即捕获投机商人92人,查获粮栈8家囤积之粮食五六百包<sup>④</sup>。只不过在1946年间,由于粮源较为稳定,政府的管制也起到一定效果,所以天津的囤积只是零星出现,未成规模。而时间转入1947年后,光景则大为不同,囤积之风席卷天津。

(二)管制市场与打击囤积

1947年初,受东北战事的影响,天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抢购与囤积粮食的风潮。是年6月12日,警察局刑事队第七分队乔维明报告,因报载“沈阳酝酿大战”,“东北驻津客商多接电报,由粮市购进大袋美粉不少,故一般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反抛为进,或勒而不售。米面价格一时上涨,大袋粉较前日每袋涨四五万元。”<sup>⑤</sup>又据市长杜建时<sup>⑥</sup>回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当时天津市的工人要求每月在工资中配发面粉,否则便罢工,因此企业“不敢不抢购粮食来敷衍工人”;学校为了安抚“进步”学生与保证教师生活也须抢购粮食;政府机关为了保障公务员的生活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改储存现款为存放实物而抢购粮食;还有一些持有大额资本的商人,不管其本业是否为粮业,皆将资本投向粮食,“非法囤粮”。如此一来,天津市面粮食便被一扫而空,一般市民难以在市面上购买到粮食<sup>⑦</sup>。

为了制止囤积居奇,市政府尝试从粮食流通方面入手,对粮食市场进行管制。1947年7月,《天津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与《天津市购存粮食实施办法》获得粮食部及北平行辕批准实行<sup>⑧</sup>。据此,专门的粮食市场被设立,所有粮食交易均须在此进行并登记,“市场内不经登记之交易,及未经呈准之场外批发粮食交易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

粮食市场主要向市内正当粮业经营者及商号、民户、机关团体开放。凡在市政府登记并领有营业证

①《粮贷款及粮议价会议决定:议价六日改定一次,贷款拨一亿元向锦州购粮》,《大公报》(天津)1946年2月16日,第3版。  
②《天津市政府商讨平抑本市粮价会议纪录》(1946年2月2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2-000627。  
③《天津市工厂复工平抑物价开仓平糶办理冬赈解决煤荒各项办理经过情形》(1946年4月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246-002。  
④《张保福为奉派视察第二次议价执行情况给胡梦华的签呈》(1946年2月1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130-009。  
⑤《乔维明关于粮市情况的签呈》(1947年6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9-3-026307-001。  
⑥ 1946年11月1日,天津市市长改由杜建时任职。  
⑦ 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26页。  
⑧《天津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1947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533;《天津市购存粮食实施办法》(1947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129-3-003996-181。

之粮食从业者、各类商号,以及民户,皆可在粮食市场内购买粮食,但不得超过3个月之需要量;机关团体不得超过2个月之需要量。非粮食从业者及正当外地客贩,若未经军政机关开具购粮证明,不得入市场购粮。若有“非经营粮业之商人囤积粮食营利者,依照《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处理。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还加派社、警两局力量,加强对各货栈仓库存粮的检查。但即使这样,仍有商人“顶风作案”。

1947年12月,社会局查出粮食批发商“德和泰粮号”大量囤积食粮。据《益世报》报道,德和泰自1947年八九月份开始便不断在粮食市场以高价竞购面粉,买后即分存各银行仓库,囤积近两万袋<sup>①</sup>。社会局的调查显示,德和泰所存各仓库之巨额粮食,多系违反市场规则,“横线交易”而来。所谓“横线交易”,即商人对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几家同业互相买卖,使售价节节上升。”<sup>②</sup>如德和泰存入金城银行仓库之面粉,系由其高价从粮食市场购得,分35次存入;中国银行仓库之存粉600袋,系由同泰公户头转来;航业公司仓库存粉“均系购自本市各批发粮商”,等等。还有,德和泰账上存户“多系假用字号,私人购存面粉,殊多不法”<sup>③</sup>。因此社会局认定德和泰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第4条:“禁止批发粮业及斗店业会员在市场内购买粮食”,及第7条:“粮食市场内不经登记之交易及未经呈准之场外批发粮食交易,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同时违反了《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之“囤积居奇”条款。据此,社会局决定先将德和泰囤积之面粉进行封存,并将调查情况上报市政府,建议依法“予以严办,以收惩一儆百之效”<sup>④</sup>。

然而德和泰并不认同社会局的调查结果,称其所存粮食内十分之九为代客保管。只是因“物价骤然波动,粮食随之增长,来势汹涌。在食用户固不肯卖出另买,徒耗佣金,而营业者亦不急于处理其中存户,更不免有旅行在外者,商号亦未便代为处理”,所以才致使存粉堆积情形的出现<sup>⑤</sup>。德和泰的辩言亦有真实之处,因为其所存面粉内确有部分为正当存户之自用面粉,如北平警备司令部修械所就在此存有员工用粉200袋<sup>⑥</sup>。

最终市政府综合各种情况决定:凡德和泰存户所存之粉,“少数自食予以发还”,“团体公用之粉有呈文证明予以发还”,正当粮商“查明许可及执照后予以发还”。以上三种条件均不符合者,需罚粉五成应市销售,并缴纳罚款<sup>⑦</sup>。依此,最终德和泰国积案内罚粉五成者共44户,计面粉7200袋,罚款74319元<sup>⑧</sup>。

综上,从扶导粮商贷款,到实行议价,再到打击囤积的过程,体现出天津市政府对市场“利用”与“管制”的双重态度,我们亦可从中透视背后的政商关系。一方面政府寻求与商人合作,并依赖其保证粮食供给,以安定社会;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驯服”商人,使商人完全服从政策管制。而实际上,只有政府的粮食政策符合粮商利益时,才能得到商人配合。当政府试图对粮商及粮食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之时,便影响到了粮商的正常交易活动,从而引起其对各种管制政策的不合作。

①《德和泰囤积图利,当局查获两万袋》,《益世报》1947年12月11日,第4版。

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等编写:《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3页。

③《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对德和泰存户的调查报告》,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07。

④《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调查德和泰囤集面粉一案给天津市政府的呈》(1947年12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02。

⑤《曲式之为声明仓库所存面粉系代客买卖情事给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呈》(1947年12月1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01。

⑥《北平警备司令部修械所为发还面粉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代电》(1947年3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10。

⑦《处理德和泰囤积面粉案会议纪录》(1948年6月1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5-3-001481-001。

⑧《天津市警社两局为奉令处理德和泰囤粉一案办理结案经过事给天津市政府的会呈》(1948年11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2479-039。

## 五、难以走出的困境及其原因

从1946—1947年的粮价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图2),天津市政府通过举办平糶、辅导粮商贷款、管制粮食市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给的困境。至少在1946年,这些措施缓和了“伏地白面”“玉米面”“小米”等民众常用粮食价格的增速,使之相对稳定。然而,1947年粮价的激涨也预示着该困境是一个“难以走出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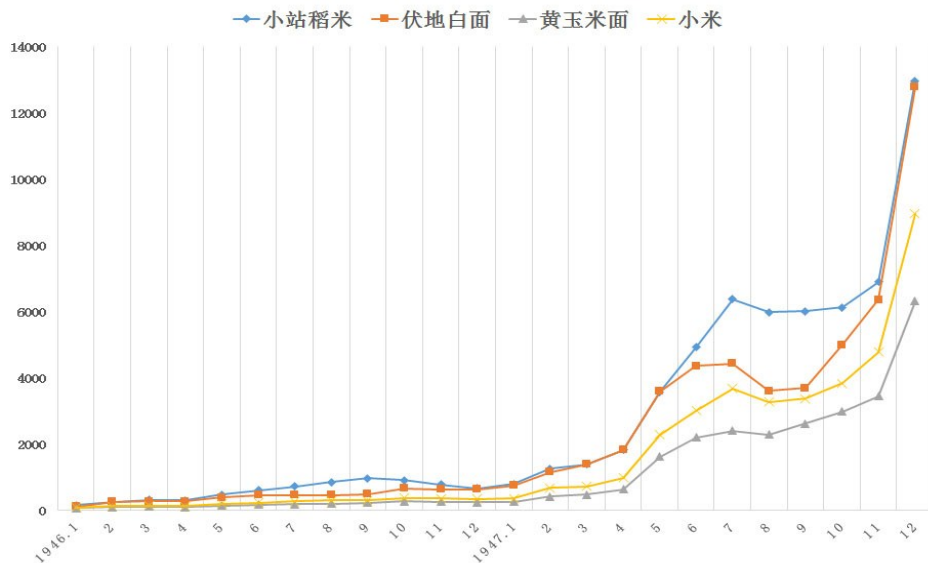


图2 1946—1947年天津每月粮食零售价格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第303页绘制。

首先,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以致粮源获取极为困难。民国前期,天津所需的小麦、杂粮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省份与东北地区;大米与面粉则主要来自上海、无锡等地。抗战胜利后,华北大部分区域为中共所控制的根据地;而国民政府政令所及者,仅平、津两市及其河北数十县(且后多发展为战区)。雪上加霜的是,天津附近的军队还在海河区域收购稻谷供给军粮,以致军粮严重倾轧民食<sup>①</sup>。同时,南方之米面受政策限制也难以流通到华北地区。1946年4月,由于上海市面粉价激涨,行政院长宋子文、粮食部长徐堪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商讨后采取四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凡由上海转口之面粉,只以善后救济署报运者为限,其他无论任何机关、个人均不准转运出口”<sup>②</sup>。此即限制了上海面粉的自由流通,从而使北来之南粮渐行减少。

再观之东北情况,虽然国民政府与公众在抗战结束时曾认为“东北丰富的杂粮将缓解中国的粮食短缺”,但是实际上,因交通运输困难,东北地区在1946年仅收集并出口了6万吨大豆及其他食物油或种子。之后,随着国共双方在东北冲突的加剧,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征用了大量军粮,反而使东北地区产生了约5万吨的粮食缺口<sup>③</sup>。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从1947年开始,主要以东北为粮食采购地的天津的“长期平糶”活动也难以进行。天津粮商在四平街购储的平糶粮,则毁于四平街解放战

① 《天津市政府为拨配杂粮事致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的函》(1945年11月3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2-3-000828-004。

② 《当局集议维持民食,禁止面粉出口》,《申报》1946年4月29日,第7版。

③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第253、258页。



争,未能运回<sup>①</sup>。

其次,国民政府未能抑制通货膨胀,导致粮食市场难以运转。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着粮食这个重要物资控制物价,并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路径不同<sup>②</sup>,国民政府在战后依然采取“议价”“限价”等战时“以价制价”的方法应对价格上涨,而实际上这些方法在抗战后期已被证明为“消极治标的办法”。<sup>③</sup>而且,为了维持高额的军费,国民政府反而因大量印发纸币并保持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使其愈演愈烈。据统计,“1946年的政府开支比前一年上升了3.2倍”,而“1947年的政府开支上升到了1946年水平的5.7倍……赤字接近支出的70%”<sup>④</sup>。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问题,严重打击了天津市民对法币的信心,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手里存法币就等于在怀里揣冰核儿,不久就化没了”,很形象地表达了市民的心态。所以1947年初,受粮食恐慌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天津市面上才会出现囤积风潮。结果至是年4月,天津粮食业已“有行无市”：“市民在市上买不到粮食,粮食市场几天开不出粮食价格来,粮食零售店关起门来,小饭铺和饭摊也陆续停止营业。拿着面袋子买不到粮食的人三五成群地在粮店门口骂街,运输工人和小本经营的商人买不到饭吃。”<sup>⑤</sup>

最后,市场政策违背经济规律,以致难以长期实行。粮食部与天津市政府虽均想依靠自由粮食市场根治民食问题,但其制定的政策却又是反市场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认为:“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的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秩序’。”<sup>⑥</sup>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Wolfgang Kasper)等人指出,“在市场过程中,人的行动受盈亏信号和自利追求的指挥。”<sup>⑦</sup>而议价的实行违背了商人意愿并以行政命令强制压低了零售商的利润——如三津磨房业公会内“各商之利润多不及一成”<sup>⑧</sup>,这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以至拒售惜售、以次充好等情况的出现。对此,周启纶记道:“议价后,粮商认为无利可图,多将粮食囤积于货栈不卖,或作黑市交易。门市则半日售粮,并在粮食里掺沙。市民苦矣,起早去粮店排队买粮,去晚了买不到。买来粮食要先捡沙子,再用簸箕簸几次才能下锅。”<sup>⑨</sup>1946年底天津市政府的一份报告也从官方证实了通货膨胀下议价政策的无力。该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交通不畅、物资缺乏、一般物价波动太快,议价并不能跟上市价变化。此外各商人也没有严格执行法令,对政策多持观望态度。以至于政府考核稍有疏略,商人即不予配合,使政府在管理与监督上至感棘手,遂致议价成效不彰<sup>⑩</sup>。更为讽刺的是,在天津市政府亲手设立的粮食市场内,“黑市交易已成公开秘密”,管理者却不敢亦不能查禁<sup>⑪</sup>。粮食市场外,“南门外祥云栈西马路项家胡同一带,粮食小贩售卖黑市,超出限价甚多,已成公开之秘密,无人制止,且

① 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0页。

② 参见潘晓霞:《东北解放区的通货膨胀及中共的应对》,《史林》2022年第1期。

③ 参见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

④ 张嘉璈著:《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第80—81页。

⑤ 杜建时:《从接收天津到垮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7页。

⑥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5页。

⑦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7页。

⑧ 《天津市三津磨坊业同业公会为遵令监督制止各会员高抬粮价给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呈》(1946年11月22日),档号:J0025-3-001695-047。

⑨ 周启纶:《解放前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纪实》,1946年2月12日记,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46页。

⑩ 《天津市社会局为收到经济部函送评议物价办法及汇报一年来办理议价工作情形给天津市政府的呈文》(1946年12月13日),档号:J0002-2-000649-009。

⑪ 《调查粮食市场报告》(1948年10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9-3-030345。

事实亦无法制止。”<sup>①</sup>

## 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形势大不如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粮荒与粮价上涨的困境交织起伏,供需矛盾突出。在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粮价大幅度波动的困境中,天津市政府通过向中央“求粮”获取敌伪存粮、开仓平糶,赴产区“购粮”增加储备、疏导粮源,同市场“争粮”促进流通、降低粮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供需矛盾。然而,由于战后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粮源难以为继;通货膨胀难以抑制,粮食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市场政策违背经济规律,难以长期实行,因此战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困境实际上等同于“绝境”,难以被根本解决。

民国前中期,由于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天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粮食市场供给体系,即使在灾荒年间,政府亦能设法干预,依靠市场保证粮食供应<sup>②</sup>。相形之下,战后天津粮食供给的失败首先根源于社会的失序。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供给体系内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社会秩序愈稳定,市场调控能力愈强,政府治理就愈容易取得效果,反之亦然。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心向战,轻忽民生之本,无视民意诉求;在社会失序和经济萧条中措置无力,治理失效。再则战后国民政府仓廩不实,未能形成稳定的粮食储备体系,在市场征购困局中强购军粮民食,既造成了市场混乱又加剧了民怨。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并不单向性地局限于市场问题或供求关系,而是攸关民众生活与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民生问题又着实关乎“天下”大势之根本。战后津府当局乃至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形成了“行政效力日减,民心愈感离弃”<sup>③</sup>的死结,似乎已经预示其最终的命运。

(责任编辑:胡文亮)

~~~~~  
(上接第51页)

观团成员未能深入了解苏联发展集体化历程的全貌,以至于一些农民代表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好处作了夸大的宣传,使部分农民产生一种共产主义可以一步到位的错觉,不少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办大社,过多地搞公共财产,以至发生强迫命令等行为<sup>④</sup>。这些教训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史鉴今,我们既应保持开放心态,加强国际交往,全面、准确地学习、研究一切有助于乡村发展的他国优秀经验,也要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各地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本国经验,做到兼容并包,在实践中升华。此其一;其二,我们既要重视先进经验、技术的推广,也要充分考虑各地条件和农民需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党员模范引领作用,寻求外部经验、技术本地化,不搞生搬硬套或者盲目移植,方可推动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徐定懿)

---

①《启泰栈杂粮市场报告》(1948年10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9-3-030345。

② 参见任云兰:《民国时期华北灾荒与天津粮食市场(1912—1936年)》,《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③ 吴湘山:《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5期(复刊)。

④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